



游踪

山情水韵旧州坝



□ 刘国富 文 / 夏传武 图

有山皆图画，无水不文章。云龙县功果桥镇旧州坝子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山光如黛，湖光如练。旧州坝景致三分，二分山色，一分水韵。

功果桥镇旧州坝子是浩浩荡荡澜沧江边上的一颗耀眼明珠，是云龙县的“粮仓”。一泻千里的澜沧江带着青藏高原的雪山味道，顺着横断山，与怒江、金沙江携手并流，一路东突西进，直指太平洋。澜沧江狂野地冲刷大地，塑造了滇西大峡谷地貌。在云龙县功果桥

镇境内形成了罕见的冲积扇平地，遗留下一个富饶的洞天福地——功果桥镇旧州坝子。

旧州坝子是功果桥镇澜沧江边上连串不规则坝子的总称，这些坝子大小不一，高低不同，形状各异。旧州坝子包括下坝坝、丹梯坝、龙潭坝、汤洞坝等众多小平坝。说是坝子，事实上，大多数是缓坡台地。

旧州坝子依山俯水，背靠道入山，东面是五宝山。道入山是碧罗雪山的一个山峰，巍峨秀丽，重峦叠嶂，森严叠嶂，云雾缭绕，气象万千。五宝山是

云龙县天池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主峰，古树参天，郁郁葱葱，松涛阵阵，气势磅礴。功果桥地处两山之间的澜沧江畔，靠山邻水，山光明媚，水色秀丽，丹青不墨，引人入胜，系人情思。

旧州坝子是澜沧江畔热带河谷地区，土地肥沃，气候温润，雨水丰沛，是旧州人民世代居住的桃园雅地和重要耕作地。“江畔山歌千顷田，横穿叠嶂百里连。”旧州坝子梯田依山就势，层层叠叠，阡陌交错。山一层，田一层，万丈梯田藏在山坳间。

由于积温高，光照充足，土壤水甜，旧州坝子盛产优质大米，出产的大米颗粒饱满，晶莹剔透，软糯香甜，爽滑可口，是云龙县独具特色的农产品。各种热带水果，火龙果、枇杷、芒果、香蕉、番木瓜等，果实硕大，味美汁多，甜脆爽口，深受市场欢迎。一直以来，旧州坝子都是衣食无忧，物阜民康的膏腴之地。

功果桥镇，原为“旧州镇”，2011年更名“功果桥镇”。“功果桥”是一个乡镇名称，又是一个电站的名字，更是一座英雄铁血大桥的名字。功果桥电站的兴建，截住了奔腾咆哮的澜沧江，使逐浪排空、滚滚西去的澜沧江变为烟水悠悠、婉风流转，水趣盎然的万顷碧波。

功果桥境内的澜沧江秀水连天，湖波涟涟，江阔天高，鸢飞鱼跃，一派江南秀色。澜沧江江水清而不淡，碧而不肥，厚而不腻，冷冷地绿着，轻轻地透着，浅浅地醉着。站在功果桥镇旧州坝子的任何角度，都可以仰望山，俯而

观水，功果桥镇田园风光如诗如画。“水如碧玉山如黛，青山隐隐水中央。”

功果桥一年四季入画，春夏秋冬都为诗。夏秋时节，细雨霏霏，澜沧江烟波千里，云峰倒影，空翠成堆。两岸稻谷弯腰，大地金黄，田畴飘香。春冬时节，翠色不改，江水缥缈，水天一色，纤尘不染。烟雨时节，细雨绵绵，浙浙沥沥，薄雾朦胧，缥缥缈缈，幽山含云，亦幻亦真。夕阳西下，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璧，波光粼粼。

“一江烟水照晴岚，两岸人家接画檐。”澜沧江边水村山郭，依山傍水，排列列，错落有致，小桥流水，翠竹飘逸，宁静祥和，美轮美奂。白墙青瓦隐映在湖光山色之中，炊烟袅袅，清风习习，瓜满架，豆满棚，闲看庭前花开花落，静听秋虫低唱浅吟。

功果桥镇历史悠久，钟灵毓秀，已有上千年的沧桑历史。曾一度为云龙县(州)治所在地，故原名“旧州”。宋朝时期设置“云龙县”，至明朝崇祯二年(1629年)知州搬迁至雅马井(现云龙县宝丰乡)。在这片神奇古老的土地上，留下多少先民的足迹和汗水，为功果桥镇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功果桥镇文韵悠悠，墨香氤氲，人才辈出，俊采星驰。很早时期就开始办私塾，设教馆，记史书，绘山川，考功名，登科第。功果桥镇至今传唱着白族古老戏种——吹吹腔、下汤、汤邓、汤洞等村逢年过节都登台唱戏。吹吹腔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深受白族群众喜爱，生生不息，经久传唱。

大理掌故

崇圣寺称“佛都”的由来

□ 母锡鸥

崇圣寺位于大理古城西北，与三塔构成大理标志性的建筑。崇圣寺始建于唐开元年间(公元713—741年)，为南诏、大理国时期著名的皇家寺院，也是当时东南亚最大的佛教寺院，被誉为“佛都”。

胡蔚本《南诏野史》记载：“开成元年，建崇圣寺，基方七里。圣僧李贤者定立三塔，高三十丈，佛一万一千四百，屋八百九十，铜四万五千五百斤。自开元中至是完工。”这段记录说明了三塔高度和崇圣寺规模。胡蔚本《南诏野史》又说：“开元元年，嵯颠建大理崇圣寺，基方七里，圣僧李贤者定立三塔，高三十丈……自保和十年至天启元年功成。匠人恭福、徽(义)、徐正立。”从这两个历史版本的记载推断，崇圣寺建寺的时间应该是南诏国初期。

南诏中期以后，王室成员和官僚大多皈依佛门。功丰祐时废道教，立佛教为国教，其母带头出家为尼，法名惠海；其妹越英公主嫁给了来自天竺的阿叱力高僧梵陀崛多。

大理国时期，今大理州辖区佛教更为盛行。大理国开国国王段思平“好佛，岁岁建寺，铸佛万尊”，使洱海地区成了“无山不寺，无寺不僧”的“妙香佛国”。元代李京《云南志略·诸夷风俗》称：“民俗，家无贫富皆有佛堂，且夕击鼓参礼，少长手不释念珠，一岁之中斋戒几半。”段氏大理国国王有22位，有9位国王为僧，多数人住崇圣寺，崇圣寺成了大理国的皇家寺院，是名副其实的“佛都”。

元朝大理总管时期，由寺僧圆护题写的“佛都”二字悬挂于崇圣寺门上，引来文人雅士的观摩，彰显了书法魅力，所营造的“钟震佛都”成为当时十六景

之一。明清时期，主要由中原传入的禅宗在大理开花结果。

据李元阳《崇圣寺重器可宝者记》记载：“寺之重器有五：一曰‘三塔’，二曰‘鸿钟’，三曰‘雨铜观音像’，四曰《证道歌》、《佛都篇》、《五》‘三圣金像’……”“五大重器”到20世纪70年代仅留存三塔。

2005年，大理市恢复重建崇圣寺，再现了“皇家国寺”的风采，结束了崇圣寺百余年来有塔无寺的历史。崇圣寺重建有9个特点：一是金碧辉煌，气势磅礴的庙宇建筑群与佛文化组合，融合了“禅宗”“密宗”的特点。二是寺院中轴线总长4000米，为中国中轴线布局最长的寺院。大雄宝殿面阔51.7米，高26米，在全国佛教寺院中体量最大。三是寺内617尊(件)佛像、法器均是青铜浇铸而成，用铜千余吨，其中599尊(件)为贴金、彩绘，为全国之最。四是木雕《梵像图卷》，画卷长117米，高1.8米，为世界之最。五是彩画的龙、石刻的龙、木雕的龙、灰塑的龙乃至瓦当滴水上的龙，数以万计，为世界之最。六是崇圣寺最大的金刚杵长6米，直径1米，为金刚杵之王。七是寺院鼓楼上的大鼓直径3.1米，堪称全国佛教寺院第一大鼓。八是高僧殿，又称国王殿。9位大理国国王不爱江山、不恋红尘，出家崇圣寺、禅位为僧的皇帝造像栩栩如生。九是当代香港著名武侠小说作家金庸在《天龙八部》中描述的“天龙寺”就是崇圣寺，它的再现圆了游侠人的梦。

崇圣寺是大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宏伟的古刹，是南诏、大理国的皇家寺院。崇圣寺千寻塔通高69.13米，是云南解放前最高的地标建筑。大理因为有了崇圣寺这样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更显示出与众不同的地位。

民俗巡礼

家乡的白族花灯

□ 李树华

我的家乡位于大理州祥云县唯一的白族聚居镇不甸镇，因村尾有一条常年水色发红、自南向北流往莲花湖的“赤水河”而名“赤口尾村”，后改名为上赤村。

祥云县的花灯，曾广泛分布于各个乡镇，其起源虽无明确记载，但在很大程度上，极有可能是随明代中原屯田汉族军人、商人移民来到“云南县”(今祥云县)并逐步发展起来的。家乡上赤的白族花灯，应该不会例外。但有趣的是，在祥云县流传至今的各个花灯流派中，唯有上赤花灯与众不同。其中最大的不同之处，是上赤花灯的唱词和它的表演形式。

在唱词上，上赤花灯可谓“半汉半白”，即唱词中有一半以上是直接用当地的白族话来唱。有的节目从头至尾，几乎都是用白族话唱出来的。比如《新娘挑水》是这样唱的——“早，舍舍尼胎舍尼胎，格艳补买脑担需，担需钩漏廖也边，高答也边钩也需，红瓜子用碰者需，红捏子答答者奶……”

这首唱词的唱本，除第一个字“早”是“汉字汉语”外，其他唱词皆“此字非此意”，是以汉字“借唱”的“汉字白唱”。翻译成汉语，为——早，小小妹子小妹子，鸡还没叫你挑水，挑水钩担丢并边，脚踩并边并水，红裤子上踩着

水，红裤子上踩着泥……

在祥云白族风俗中，新媳妇过门后的第二天早上，要天蒙蒙亮就第一个起来，挑一担“新水”回家，这是衡量新媳妇是否勤快的重要标准。这段花灯唱词，把一个刚过门的新媳妇到并边挑水的可爱形象，活灵活现地表现了出来，宛如一幅朴实的乡村风俗画。如此接地气、与生活没一点距离的花灯唱词，加上扮演者惟妙惟肖的表演，让人乐此不疲，百看不厌。用今天的话来说，也算是一种“沉浸式”的表演吧。

在表演形式上，上赤花灯的角色，始终传承着古老而又别具一格的“男扮女装”式。我曾经对此感到不解，经请教相关传承人后方才得知，此形式源于过去当地女子不得参与花灯表演的习俗使然。既然女子不得参与，那花灯戏中的女子角色只能由男子来扮演了，这也是一种没办法的办法吧。可让人惊讶的是，“男扮女装”竟然不假那些戴假发、穿女子衣服、走女步、唱女声的扮演者。

值得一提的是，上赤花灯的不少唱词，包含的皆是满满的“正能量”。其中不乏尊老爱幼、邻里互让、勤劳致富、科学种田等唱词，与今天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一致的。另外，上赤花灯剧本中的许多唱词、唱腔小调，总是朗朗上口，能让人过耳不忘。这种“自产自销”“自娱自乐”的地方戏剧形式，在过去几十年时间里，对于普及家乡父老

乡亲的文化知识，尤其扫盲识字和汉语的推广应用，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我母亲的许多社会经验和知识，还有汉语，便是通过花灯的启蒙而学会的。她虽未上过一天学，但一说起二十四气、物候、十二属相，却能信手拈来，不差分毫。让人称奇的是，花灯中反复吟唱的那些汉语唱词，之前不会说汉语的母亲，竟也能倒背如流。这些，皆源于花灯的耳濡目染。

在老一辈人眼里，每年春节期间的闹花灯(白族语“曲灯”)，是家乡一年一度的盛大节日。在闹花灯活动正式启动前，首先要进行庄重的祭拜神仪式，然后在祠堂进行排练。接下来就是送“灯帖”，进入正式的入户表演环节。多年来，上赤花灯始终严格遵守着老祖宗传下来的“三不唱”规矩，即“白天不唱灯，平常不唱灯，家里不唱灯”。也就是说，花灯表演只能安排在晚上，除正式表演外，没有人会“张嘴就来”随便唱出花灯腔调来。

多年来，上赤花灯的腔调基本上没什么大的变化，稍有变化的也只是其中的部分唱词。传统剧目有《进城花鼓》《赵三王卖钱》《采茶》《王大娘补缸》《团场调》《送郎调》等十多个。参与花灯队的表演者一般为18人，即大头和尚1人、场头1人、大娘1人、卖膏药者1人、货郎1人、提彩灯者1人、舞狮子者2人、耍猴子者2人、八大金刚8人。另外，还有随

队而行、边走边奏乐的鼓乐队。

每年大年初二到正月十五的晚上，花灯队在人们的簇拥下，一路敲锣打鼓，依次往递过“灯帖”的人家行进。行走在队伍前面的，是四个手持大排灯的人，进场后分别置于四角，既能烘托现场气氛，又能起到固定表演现场、维持秩序的作用。其中龙灯和凤灯各二盏，上书“国泰民安”“恭贺新春”“五谷丰登”“太平花灯”等吉庆之言。

在众多表演节目中，让人印象深刻的，当数《魁子舞》一舞。该剧目表现元代蒙古人统治大理时，与当地白族融合、共同生活、开发边疆的真实历史事件。表演者为魁子、魁婆二人共舞。魁子穿着蒙古人服饰，左手提灯笼，右手持骑马用的鞭子；魁婆则为当地白族妇女，头戴勒箍，勒箍下拖着一长条辫子，腰围绣花围腰，双耳戴环，左手提灯笼，右手拿舞扇。魁子舞蹈动作粗犷夸张，有来自北方草原的豪迈风情；魁婆则以当地特有的民族舞蹈相配合，眼神中蕴含着南方民族的柔情。如此和谐的一幕，发生在民族矛盾异常尖锐的元代，不禁让人感慨。

时过境迁，和许多历史现象一样，上赤花灯这一传统文化，也不可避免地消失在时光深处，但它曾经植根于家乡的乡音、它曾给家乡父老乡亲带来的快乐，还有它给和我一样在外地的游子带来的对故土的深深眷恋，让人久久难以忘怀。

生活笔记

杀年猪

□ 李景忠

入冬之后，寒意步步逼近，寒气无声弥漫，凛冽的寒风横扫枯叶与尘埃，掠过寂静的村庄，将冬日的萧瑟悄然带入农家户户。仿佛有人在轻声诉说，寒意愈发浓烈，却遮掩不住岁月流淌的融融暖意，正值宰杀年猪的时节，这便将冬日的萧瑟悄然化作美美生活的序曲。

年猪，是一家人全年肉食的重要菜肴。有的家庭养一头，有的养两三头，这年猪不仅承载着过年的盛宴，更是全家辛勤劳作的鲜活见证，满载着朴素而深沉的期盼。每当寒冬来临，村庄便沸腾起来，大人们早早起身，燃起熊熊火塘，煮沸一锅滚烫的热水，备好待宰年猪的刀具和宽大的盆子。待猪被捆绑妥当，那头膘肥体壮的年猪被缓缓牵至屠宰台，屠宰便开始了。大锅里腾腾的蒸汽升腾，与冬日的寒气交融成一片朦胧的氤氲，寒风虽凛冽刺骨，却掩不住大人和孩子脸上洋溢的喜悦。此时，鲜红的血液汩汩流入盆中，猪血越涌越多，象征着来年的富足与吉祥。

杀年猪，这一传承千年的民族文化习俗，不仅承载着丰富的饮食文化，更蕴含着深厚的人文情怀，令人深切体会亲情、友情和乡情带来的心灵慰藉。尽管时代变迁，社会进步，猪肉已非稀罕之物，但这一习俗仍在延续。年猪象征着团圆，首餐常用来款待邻里，体现了邻里和谐。杀年猪的喜悦在邻里间洋溢，每一块肉都承载着祝福，邻里间的相互馈赠，如同鲜红的猪血般，预示着来年五谷丰登、家宅安宁。习俗的延续，正是淳朴乡情最生动的诠释，它无声地诉说着：无论时代如何变迁，这份属于民

族的人文情怀，传承着传统农耕文化的根脉，表达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以及收获冬藏的农耕智慧理念。猪肉被妥善贮藏成风干的腊肉，反映了传统秋收冬藏的农耕智慧。杀猪后，猪肉与猪尾并置，寓意有头有尾，寄托着生活丰衣足食的美好期盼。至关重要的一步，是在祭祀中扮演着核心角色。广泛应用于各类仪式，在杀猪祭祖之际，青烟袅袅升腾，烛火摇曳生辉，案桌上供奉精心烹制的猪头、猪尾及热气腾腾的整块肋排，长辈口中轻声诵读祝词，将一年丰收的感恩与对来年的热切期盼，虔诚向往先倾诉，寓意有始有终、丰饶富足，彰显虔诚之心。这份源自农耕传统的习俗与信仰，年复一年传承，成为冬日村庄中最动人的风景，永远是冬日里最温暖的底色。

在传统文里，猪始终被视为财富与丰收的象征，这一观念深深植根于古人对农耕社会的深刻理解中。现代物流的便捷，无法替代那份浓浓的乡愁滋味，厚实的猪后腿，正是腌制火腿的上佳之选，被精心地抹上粗盐后，耐心揉搓，让咸鲜的滋味丝丝渗入肌理。然后，火腿被悬挂在通风的屋檐下，或是特制的熏房里，经历数月风露的洗礼，烟火的熏染，色泽逐渐沉淀为深沉的胭脂红，陈放一两年，就是上等的火腿。这不仅是储藏智慧的延续，更是将时光的精华，演变成冬日里的馈赠，成为百姓家日后餐桌上令人回味无穷的珍馐。待到封冻之日，那油润透亮的肉质，只需薄薄几片，便足以唤醒沉睡的味蕾，无论是清蒸、炖煮，还是简单切片佐酒，那份沉淀的咸香、丰腴的油脂感，以及蕴藏的淡淡烟熏气息，都是对一年辛劳最丰厚的犒赏，是刻在骨子里的乡愁滋味。

纳张元当选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副会长

本报讯(记者 王晓云) 11月23日，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第十届代表大会在西安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150余名会员代表参会，大会选举产生了第十届理事会；由理事会选举产生了第十届常务理事会及会长和副会长。大理著名作家、大理大学文学院教授纳张元当选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第十届理事会副会长。

纳张元是中国少数民族艺术博士，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是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云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是“史学岭文化名家”“享受云南省人民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云南省有突出贡献的专家”“省委联系专家”“云南省德艺双

馨文艺家”“云南省德艺双馨青年作家”“云南省高等学校教学名师”，中国文联首批“中国文艺评论基地”首席专家。

纳张元于2020年12月首次当选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第九届理事会副会长，本次换届连任第十届理事会副会长。这是学界对纳张元学术成就和社会影响力的一种认可。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是国家一级学会，学会宗旨为团结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工作者，积极开展科学研究，进行学术交流，加强民族团结，促进少数民族文学事业的发展与繁荣。学会每年组织召开学术年会，并定期举办专题学术研讨会，探讨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历史、现状和趋势。

大理美



洱海滩涂生态美

11月30日，洱海西岸滩涂里的水草、树影在静静的洱海水中呈现出迷人的冬日景致，吸引着众多游客和本地居民沿着生态廊道细细品味。 [夏传武 摄]